

# 冷战时期台湾与南越的关系

[美]林孝庭

(美国斯坦福大学 胡佛研究所 美国)

**摘要:** 本文利用大量中、英文源文件与相关人士的回忆录、日记等资料,对冷战期间国民党政府与南越关系,作一有系统的回顾与分析。首先,本文回溯1954年日内瓦会议前后,由国民党将领黄杰所领导之留越部队所扮演的军事情报角色,并探讨20世纪60年代中南半岛军事危机升级后,“越战”如何成为联接台湾与美国关系下的重要一环,以及台湾在援助南越政府过程中所扮演的诸多重要角色。其次,文中还将揭示蒋介石如何利用越战局势,向美国推销其一生中最后一次大规模军事反攻大陆的尝试。最后,文章聚焦于1969年至1975年间,尼克松总统倡导“越战越南化”并逐步退出越南战场的最后数年岁月里,台湾当局如何配合执行美国的中南半岛政策,并且继续协助摇摇欲坠的南越政府,以及秘密支持邻近高棉朗诺政权。

**关键词:** 蒋介石;越南战争;吴庭艳

中图分类号: D675.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9856(2018)03-0015-16

DOI:10.14073/j.cnki.nywtj.2018.03.002

## 前言

1949年12月,国共内战已经进入最后阶段,随着中国大陆西南各省相继解放,蒋介石则黯然离渝,转进台湾,此后终其一生,未曾再能回到中国大陆。与此同时,以美、苏为首的国际冷战对抗态势也拉开序幕,此后将近半个世纪,全球笼罩在冷战对峙、分裂的格局当中。蒋介石失去中国大陆而退守台湾海岛一隅,让他注定无法在全球冷战大舞台上,扮演如同中、美、苏等国际强权领导人一样的关键作用。然而,在亚洲的冷战舞台上,随着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的先后爆发,以及台湾所处的居亚太地区战略枢纽位置,让1949年以后蒋介石所领导的台湾,在“区域性”的冷战场上,仍扮演一定之角色,二次大战结束后的越南问题,以及环绕着整个越南战争所引发的争议,即是一个重要例子。

回顾历史,在冷战最高峰的20世纪60年代,台北与南越西贡政权曾因彼此间强烈的反共意识形态与地缘战略因素,建立起唇齿相依的盟邦关系。本文利用大量中、英文解密档案与相关人士回忆录、日记等文献资料,对整个冷战期间台湾与南越的关系,进行回顾与分析。文章首先分析1954

收稿日期: 2018-07-14

作者简介: 林孝庭,男,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胡佛档案馆东亚馆藏部主任,哲学博士。

年日内瓦会议前后,黄杰率领的滞越国民党部队所扮演的秘密角色,继之探讨20世纪60年代中南半岛军事危机升级后,“越战”如何成为联系台美关系的重要一环,特别是在这个过程中,国民党政府在援助南越上所扮演的诸多重要角色。其次,文中也将揭示蒋介石如何设法利用中南半岛局势,向美国推销其此生中最后一次军事反攻大陆的尝试。最后,文章聚焦于1969年至1975年间,美国总统尼克松(Richard Nixon)倡导的“越战越南化”问题,以及在决定逐步退出越战的最后数年岁月里,台北如何继续设法协助摇摇欲坠的南越政权,如何秘密支持高棉的朗诺(Lon Nol)政权,以维系中南半岛上的反共势力。

## 一、国共内战与越南问题

1949年11月,随着国共内战进入最后关头,由白崇禧所辖之国民党“中剿匪总司令部”第一兵团主力部队,决定自桂林紧急撤入越南境内并且建立根据地,以图保存实力。12月12日,抵达桂、越边境的第一兵团司令官黄杰,派员与法越殖民当局交涉,黄杰主动向法方提出双方合作消灭胡志明“越盟”的构想,藉以换取法方同意国民党残部进入越南境内避难。法方对于联合对抗“越盟”的提议未置可否,但同意依照国际法原则,让黄杰部队在解除武装后进入越南境内。翌日起直到1950年1月底,共计有包括黄杰的第一兵团、华中战区国民党残部与广西境内各部与民团等约3万2千余人,分批进入越南境内,并暂时被集中在越北法军莱姆法郎(Leme Franc)与蒙阳(Mong Duong)两个营区,由黄杰担任中方总负责人,所有入越国民党军被编成两个管训处,下辖7个总队。<sup>[1]</sup>

当时国民党政府甫自成都迁往台北,李宗仁“代总统”已前往美国“医病”,蒋介石以中国国民党总裁身分,统筹一切党政军要务,此刻台北高层曾就桂越边区后撤国民党部队情况,拟订一机密策略。虽然,黄杰所辖第一兵团大多数进入越南后被法方缴械,然而有鉴于当时中、苏皆已承认胡志明政权,且美、苏两强之间又在东南亚地区竞争,白崇禧因而建议蒋介石将黄杰入越部队组织为一“反共志愿军”,协助美、法对抗越北共产党势力,并认为此举有助于改善国民党当时风雨飘摇的孤立处境。<sup>[2]</sup>蒋介石对于白崇禧这一提案,一度颇为心动,并曾于1950年3月间密令黄杰,未来务必设法阻止入越国民党部队继续向法方缴械,如迫不得已时,应当能够争取在中越边境地区“钻隙游击,以保存实力”。<sup>[3]</sup>

蒋介石对于如何安排与布置当时尚留在桂、越边境,与解放军作垂死挣扎的其他国民党部队,则另有想法,特别是原华中“剿匪总司令部”所辖的刘嘉树第17兵团的两个军的兵力,属于正规部队,声势颇大。1950年1月12日,刘部自桂、越边界的平孟隘电告台北,共产党在该地区影响较大,无法建立根据地。越北地区多为胡志明所控制,鉴于解放军随时可能追上来,刘嘉树请求台北设法与法方交涉,让第17兵团所残存的6千余兵力,能够借道海防,由国民党船舰运离越南。刘甚至表明不惜与法国驻军开战,以求能够挺进海防,杀出重围。<sup>[4]</sup>此时,蒋介石仍试图在西康省境内建立最后反共根据地,整合所有当时仍留在中国大陆西南地区的武装力量,因此电令刘部应进入胡志明“越盟”区域内,尽力活动,避免与法方接触,蒋并表示将尽速空投接济该部,以利其留在桂、越边区继续努力。<sup>[5]</sup>

1月14日,当刘嘉树奉蒋介石之命,率部进入越北地区后不久即遭“越盟”武装力量包围,无法继续向南挺进,正在徘徊观望之中,忽闻广西边关要塞平而关与水口关一带空虚,乃决定回师夺取该两地以求暂时立足。<sup>[6]</sup>台北军方高层也积极着手准备空投补给弹药、军火与银元给刘嘉树所部。2月1日,刘率部猛扑平而关与水口关,却遭遇解放军第四野的围剿。刘紧急向台北求援,蒋介石

立即核准将一批军火弹药由台湾空运海南岛,准备对刘部进行空投。<sup>①</sup>然而,台湾军方的空投作业根本赶不上桂、越边境战况的快速变化,经过2月5日与6日两天激战后,解放军将刘嘉树所辖6715人全部歼灭,刘本人也被俘。台湾方面空投作业临时喊停,而蒋介石欲运用刘部于中国西南地区的最后一丝希望,也随之破灭。<sup>[7]</sup>

1950年3月起,随着法军在越北地区与胡志明之间的战事节节败退,被拘留于莱姆法郎与蒙阳两个营区的国民党部队,开始分批被迁往越南最南端的富国岛(Phu Quoc Island)与金兰湾(Cam Ranh Bay)两处安置。<sup>[8]</sup>同年6月底,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宣布第七舰队协防台湾,东亚局势发生了重大转变。当国民党在台湾的局势转危为安之际,蒋介石也重新思索如何利用朝鲜战争局势来反攻大陆,开辟第二战场。此刻正值法国殖民当局陷入战争泥沼,留越国民党部队的角色,也开始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该年7月底,当时领导国民党滇缅游击队的李弥,向台北建议应与法、美等国密切磋商,以共同保卫东南亚地区,从速建立滇缅与滇越陆上反共基地,调留越部队入滇西、滇南,建立策动全滇反共武装根据地。<sup>[9]</sup>11月,美国驻台北“公使”蓝钦(Karl Rankin)首次奉华盛顿之命,与台北磋商留越部队角色问题。台北方面向美方表明,希望法国当局能够将这批国民党部队,连同武器装备运返台湾。若法方碍于各方考虑而无法办到,则应迅速就地重新武装,与法方并肩作战,对抗“越盟”。<sup>[10]</sup>蒋介石探悉美国此时似乎颇有兴趣利用留越国民党部队,对抗亚洲地区共产党力量,因此向美方进一步表示,不排除同意让留越部队就地武装之后,协助越南南部地区的防务,但前提是该部须保持独立指挥系统,不得并入法国部队。<sup>[11]</sup>为此,台北军方高层于11月4日密电黄杰,尽速着手设立一“留越国军管训总处”,由黄杰本人担任司令官,总处下设3个分处,每处下设3个总队,留越各部队原有番号一律撤销。<sup>[12]</sup>显然,台北高层此刻希望把这批流亡境外的残存力量重新组织起来,以备日后不时之需。

从1950年底直到1952年秋天,中共以志愿军名义参加朝鲜战争,致使美军在朝鲜半岛上战况胶着。与此同时,法国在越南境内则不断遭受军事挫败,频向美国求援,美国在亚太地区面临极为沉重的压力。美国的军事情报部门不断设法寻求能够牵制中共的各项策略,包括秘密援助滇缅地区国民党游击队骚扰云南边境、训练与协助国民党游击队对中国大陆东南沿海发动海上突袭、培植国民党以外“第三势力”游击队空降中国东北与沿海省份等,而利用黄杰留越部队发动反攻西南省份,或者协助法方与越共作战的可能性,也不时被美方提出来讨论。<sup>②</sup>1951年2月,因为执行美国中央情报局秘密援助李弥部队而与美方颇有往来的国民党驻泰国“大使馆”武官陈振熙,曾飞赴西贡与黄杰会晤,传达美方关切留越部队如何运用等诸多问题。对于美方有意武装该部的试探,黄杰曾表示肯定之意。<sup>[13]</sup>同年7月,蓝钦还建议美驻台军事顾问团团团长蔡斯将军(William C. Chase)前往越南视察留越国民党残部,并与法国当局讨论如何让该部投入远东地区的反共活动,后因美国驻巴黎与越南外交官员强烈反对而作罢。<sup>[14]</sup>

然而,从法国立场而言,贸然将国民党留越部队遣返台湾,恐怕引发北京方面以“干涉内政”为

---

① 这批弹药包括七九步枪弹10万发、三〇步枪弹1万发、卡宾枪弹2千发、信号枪弹300颗、火箭弹50发等,参见《顾祝同致联勤总司令部兵工署》(1950年1月20日),《滇桂越缅边区国军战况及刘嘉树等部求援情形》,《史政档案》档号:0042857/007;《顾祝同呈蒋介石》(1950年2月6日),同前,档号:0042857/011。

② 有关此类讨论可参见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Subject “Chinese Troops in Indochina,” August 29, 1951, in United State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以下简称 *FRUS*), 1951, Vol. 6: *Asia and the Pacific*, Part 1,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7, pp. 488-489; Dean Acheson to the U.S. Legation in Saigon, September 24, 1951, *ibid*, pp. 523-524; State Department to the U.S. Legation in Saigon, December 3, 1951, *ibid*, pp. 551-552; Memorandum for Dean Acheson, Subject “Chinese Intervention in Indochina,” December 19, 1951, *ibid*, pp. 562-563.

由出兵越南, 遽论允许留越部队重新武装, 并投入对抗越共的战事。因此, 在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 法越殖民当局面对滞越国民党军, 根本不愿有任何举动, 华盛顿与台北高层即便有意充分利用该部, 亦无可奈何。<sup>[15]</sup> 直到 1953 年春, 朝鲜半岛局势走向缓和, 台北与法国终于就遣返留越国民党军回台一事达成协议, 由驻台美军顾问团提供经费与后勤协助, 将 3 万余名部队分批运返台湾。<sup>[16]</sup> 在将近 3 年半的时间里, 滞越国民党残部处于一个进退不得的窘境, 备受艰辛折磨, 然而“留越国军管训总处”的存在, 却也曾扮演一个鲜为人知的角色。这一时期, 台湾利用中南半岛上的这一据点, 借助其驻西贡“总领事馆”的外交掩护, 向东南亚各国与中国大陆西南各省派遣特务人员, 以及充当自滇缅地区与西南各省后撤、安置与中转反共游击队的一个重要枢纽。

例如, 国共内战后期曾担任贵州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兼国民党军第 101 军军长的韩文焕, 于 1951 年 5 月 9 日自香港经泰国曼谷抵达西贡, 与黄杰密谈如何以“留越管训总处”为基地, 向贵州进行游击、秘密活动的可行性。双方还曾决定抽调部分富国岛留越国民党军人员, 组编训练成一支“贵州游击队”, 以备日后不时之需。<sup>[17]</sup> 此外, 1948-1949 年担任贵州省财政厅主任秘书、贵州省“反共保民委员会”秘书的陈本昌, 自 1950 年 10 月起即奉台北军事情报单位的指示, 在金兰湾与富国岛进行秘密考察与布置。韩文焕抵达越南不久后, 陈本昌随即奉命前往泰国与滇缅边区, 与李弥部队密商未来利用留越、留越两支游击部队, 共同反攻与渗透中国西南省份的可能性。<sup>[18]</sup> 1952 年春, 时任台北“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副主任(主任为蒋经国)的陈大庆, 自曼谷考察后飞抵西贡, 与黄杰讨论如何利用越南作为国民党对大陆秘密工作的跳板。<sup>[19]</sup> 1952 年 11 月, 黄杰自越返台述职期间, 更与李弥旧部、时任“云南绥靖公署”驻台北办事处处长郑希冉, 磋商调派部分留越优秀干部, 前往泰北地区协助李弥推动游击工作。<sup>①</sup> 直到 1953 年初, 台北的军事情报系统仍然持续要求从富国岛与金兰湾的国军抽调部分人员, 担任粤、桂与滇缅边区的谍报与游击任务。对于此类请求, 黄杰自己在日记里披露, 他多在能力范围之内答允。<sup>[20]</sup>

“留越管训总处”也成为当时中国大陆亲蒋游击人士外撤的一个重要据点。据统计, 1951 年五六月间, 来自云南与广东的反共游击队自桂、越边界抵达河内、海防并辗转来到西贡者, 计达 4 百余人。同时, 另有前国民党军 272 师 2 千余兵力, 在师长余启佑的率领下, 历经近两年的游击战, 由黔、桂、滇边区沿途与解放军作战, 最后被迫转入越北地区, 并获得管训总处收容。<sup>[21]</sup> 直到 1953 年初, 仍不断有来自粤、桂地区的国民党游击队员与眷属, 陆续进入越南。据国民党方面宣称, 这其中也有中共所伪装的反共人士, 欲渗透至管训总处, 欲辗转前往台湾工作与潜伏。<sup>②</sup> 台湾利用其在越南的单位作为渗透华南与西南各省的据点, 一度让国际间, 特别是英、法两国, 高度担忧此举恐将引发中共增强对中国西南边境的军事部署, 并激化越南内部的冲突局势。<sup>③</sup>

## 二、东亚冷战架构下的台、越关系

1954 年 5 月 8 日, “越盟”部队取得奠边府(Dien Bien Phu)战役胜利, 法军投降。随后在日内

① 当时所选定首批赴泰北工作人员包括刁家柱、普国泰、龙鹏程、龙益干等 4 员。参见黄杰:《留越国军日记》, 第 478、490 页。

② 根据黄杰日记所载, 自 1951 年初起, 已查获“共谍”13 人藏匿于管训总处内。参见黄杰:《留越国军日记》, 第 521、525-526 页。

③ 有关此类看法, 参见 Mr. J. C. Hutchison (British Charge d'Affaires in Beijing) to British Foreign Office, November 11, 1950, Foreign Office Records (以下简称 FO), 371/92191 K 1023/102, British National Archives, Kew, London; Hutchison to Foreign Office, January 12, 1951, FO 371/92232 FC 1026/5; L. H. Lamb (British Charge d'Affaires in Beijing) to Foreign Office, February 22, 1952, FO 371/92202 FC 1013/9。

瓦会议上,法国同意印度支那诸殖民地独立,并以北纬17度为界,将越南划分为二,北方由胡志明领导,称“越南民主共和国”,南方则由保大皇帝所领导的越南国管辖,老挝与柬埔寨则实施“中立化”政策。然而美国与保大政府拒绝签署《日内瓦协议》,这也为美方日后介入中南半岛事务并出兵越南,埋下了一个伏笔。<sup>[22]</sup>台北当时并非日内瓦会议的参与者,面对《日内瓦协议》,蒋介石选择与美国及保大政府站在同一立场。然而事实上,连保大政府本身对于南越未来前景也没有十足把握。日内瓦会议召开后不久,人在法国的保大皇帝即派遣其亲信、时任越南高台教教主的范公稷(Pham Cong Tac)前往台北会晤蒋介石,寻求支持。保大皇帝希望台湾能够允诺利用滇缅游击部队,协助南越政府抵抗胡志明的军事威胁。<sup>[23]</sup>范公稷的台北之行也成为法国势力逐步退出中南半岛后,台湾与南越之间的首次高层互动。1954年6月初,保大任命吴庭艳(Ngo Dinh Diem)担任越南国总理。翌年8月,北越提议举行全越大选,此议获得法国政府与保大本人的支持,然而却遭到吴庭艳与幕后支持他的美国政府的坚决反对。保大在法国的唆使下免除了吴庭艳的职务,但吴有恃无恐,于10月23日举行公民投票,决议废除保大国家元首地位,改制共和,由他本人担任“越南共和国”首任总统。1956年3月,南越进一步举行国会选举,并制订了一部新宪法。<sup>[24]</sup>1955年10月26日,吴庭艳就任总统当天,台湾立即宣布承认越南共和国新政府,同年12月双方宣布建立“外交”关系,此后高层互访颇为密切频繁。<sup>[25]</sup>

真正让台北与西贡关系提升至有如“唇寒齿亡”的关键因素,在于北越当局于1959年决议以武力统一越南全境,并准备派遣大批军事人员渗透至南越,进行武装颠覆活动。1960年12月,在北越越共中央委员会的支持下,“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简称“越共”)于南越境内成立,并开启了长达15年的反西贡政府游击战。吴庭艳面对来自北方的武统威胁,还要处理南越境内共党力量在乡村地区的游击战,同时又必须努力整合南越政府军内部派系问题,焦头烂额之下,他决定向蒋介石寻求协助。1960年1月,吴庭艳前往台北访问,受到热烈欢迎,离台前夕,吴向蒋介石、蒋经国父子提出要求,希望台湾方面派遣一位将军前往南越考察,协助推动越南反共事业。蒋介石指派时任政工干校校长、蒋经国亲信王升,来担负此一任务。<sup>[26]</sup>王升经过3个多月的考察,于1960年8月中旬返回台北。3个月后,越南伞兵司令阮正诗(Nguyen Chanh Thi)发动政变,包围西贡总统府,企图逼迫吴庭艳改组政府。虽然,政变很快被平息,然而该事件给南越政府高层的士气与声誉带来极大打击。政变平定后,王升与蒋经国于该年底先后飞赴西贡与吴庭艳会晤,表达国民党支持与慰问之意。在这两次会晤中,吴表达希望台北协助南越军队建立政治作战制度,这一要求促成了日后国民党“奎山军官团”在越南的成立。<sup>[27]</sup>

1961年1月2日,由王升所率领的7人军官团抵达西贡,执行为期1年的援助任务。台湾的军官团协助越南军方成立了心理战训练中心,编写教材、授课与巡回演讲座谈,开办政治作战研究班与初级班。这让过去接受法国军事训练的越南军官,开始接受政治作战制度的概念。<sup>①</sup>与此同时,台北军方也开始向南越秘密提供小额军火物资,甚至与越方讨论由台湾提供技术越方来制造轻武器与弹药的可行性。<sup>[28]</sup>“奎山军官团”于1962年1月结束工作返台后不久,西贡当局又向台北提出派遣一位“心战顾问”的要求,吴庭艳希望台湾能够秘密协助南越政府建立一座心战广播电台,播送中、越双语节目,以强化南越对越共的心战与宣传攻势。<sup>[29]</sup>台北同意该请求,派遣“奎山军官团”的成员刘戈仑担任南越政府心战顾问。在派驻近一年的时间里,刘戈仑协助南越政府推动心理作战与政治作战业务,积极促成越南中、高阶军官分批前往台湾受训与学习观摩。他还与南越军方协调拟定了新的政战法规与训练课程,帮助安宁署推动情报安全网络、内线运用与军中嫌疑份子处置等方面的业务。<sup>[30]</sup>

① 有关“奎山军官团”在越工作情形,以及其所面临的挑战,参见陈祖耀《西贡往事知多少》,第71-120页。

与此同时,台北与西贡之间的军事情报合作也逐步展开。1961年美国肯尼迪(John F. Kennedy)总统上任后,中情局鉴于越共分子不断自北方进入南越,而当时美国法律明文规定禁止美国官方直接向南越提供情报拦截支持。因此,美国决定向台湾寻求协助,由台湾军事情报单位代训南越情报拦截与解码人才,最后更直接由台北派员前往西贡,负责参与截取越共情报。<sup>[31]</sup>1962年起,应中情局之邀,时任台北国防会议副秘书长的蒋经国,开始主持一项代号名为“南星”的机密计划,由台湾空军派遣一组共计23名的空、地勤人员,配合1架DC-4民航机与数架C-46运输机进驻西贡,协助训练南越特种部队跳伞、空投南越情报人员进入北越境内、协助运送南越山地部队以及空投补给物资至南越各战略据点等。这一计划持续数年之久,其规模也随着越战局势升级而逐渐扩大。到1975年越战结束前夕,“南星”计划已发展成为涵盖整个东南亚地区的大规模空运服务系统。<sup>[32]</sup>

事实上,1962年中南半岛上局势最混乱且最受美国关注的地区应属老挝。1959年下半年起,老挝内战全面爆发,亲西方的右派势力,与寮共(Pathet Lao)之间展开大规模战斗,加上老挝内部中立、左派与皇室等几股不同政治势力之间的权力竞逐,让这一中南半岛上的内陆小国情势极端扑朔迷离。蒋介石一方面忧心共产党力量最终在老挝占上风,进而威胁南越的安全,同时又担心美国对老挝局势恶化漠不关心,因而于1961年下半年起,强力推销并设法筹组“亚洲反共联盟”(Asian Alliance)。蒋的基本构想是透过亚太地区集体安全的努力,来防止共党势力的扩张。根据蒋的初步规划,该联盟核心成员应包括未参与“东南亚条约组织”(SEATO)的台湾、南韩与南越,并可涵盖泰国与菲律宾。<sup>[33]</sup>而1960年初吴庭艳访台后台北与西贡所建立的密切军事合作关系,更一度让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认为蒋介石颇有可能决定派遣部队,以“志愿军”名义开赴中南半岛协助西贡作战。1961-1962年,美国驻台北“大使”庄莱德(Everett F. Drumright)曾不止一次向华盛顿报告,台北高层确实不排除这种可能性,然而前提是西贡向台北正式提出要求,且需获得美方的首肯。<sup>[34]</sup>

### 三、美国升级越战局势下的台、越关系

自20世纪60年代初期起,尽管台北与西贡双方因强烈反共意识形态而建立起密切盟邦关系,但南越内部政局却日趋恶化。1963年5月,顺化地区发生佛教徒反政府暴动,进而演变成为佛教徒自焚事件,加上吴庭艳处置不当,南越境内各地反政府运动变得一发不可收拾,美国舆论要求停止援助西贡,联合国决议派员调查吴庭艳如何迫害佛教徒。<sup>[35]</sup>为此,蒋介石于9月21日急派王升前往西贡,向吴庭艳表达关怀与慰问。不料此次会面,竟成了吴与台湾之间最后一次接触。11月1日,南越军方发动政变,将吴庭艳与其胞弟吴廷琰杀害,自此也改变了南越内部形势与最后命运。<sup>[36]</sup>吴庭艳遇害的消息给蒋介石带来巨大的心理震撼,他在隔天的日记里写道,“昨日越南军队叛变,此乃由美国指使所演成甚明,为美国之幼稚与不智之行为殊为心寒。今早得报吴廷琰及吴廷儒(琰)皆于十时自戕,更令人激愤,美国之残忍不道德此也,吴氏兄弟诚不愧为爱国忠勇之革命斗士也。”<sup>[37]</sup>11月3日,蒋介石与蒋经国讨论越南政局,他担心“以后不知美国对越南如何解决,而对亚洲反共受美援各国以及自由世界对美国所发生悲愤心理与恶劣之影响,其后果又将如何,特别对于越南军队如何维持军心而不受共党渗透矣,此种情势美国似乎毫不计及,而以达到其推翻吴庭艳目的为其得意之作乎,不禁为之寒心。”<sup>[38]</sup>

此后,南越政局日趋不稳,先由发动政变的总统府军事顾问杨文明(Duong Van Minh)出任国家元首,领导一个由12名将领所组成的军事执政团。然而短短不到3个月时间,该政权就被阮庆(Nguyen Khanh)、陈善谦(Tran Thien Khiem)与阮文绍(Nguyen Van Thieu)3位将领所发动的另一

场不流血政变所推翻。<sup>[39]</sup>当时法国总统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宣布与北京建交,并欲努力推动南越的“中立化”,阮庆等将领们公开声称,其发动政变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要阻止杨文明等人与法国合作,与北越、中共展开接触。蒋介石面对法国承认北京并与台北断交的严重打击,对于阮庆所主持的西贡新政权,自是全力支持。政变后翌日,台北高层立即电贺阮庆给予“外交”承认。<sup>[40]</sup>3月初,王升奉蒋介石之命,再次飞赴西贡,亲自向3位领导政变的军官传达台北支持与合作之意。此后数月,南越军政高层赴台访问,络绎不绝。双方关系空前密切,有关筹组亚洲反共联盟的声音,也不断在台北与西贡外交圈内广为流传。<sup>[41]</sup>4月,南越新领导层甚至告诉蒋介石,若美国不愿支持该反共联盟,台、越、韩、老挝等可以采取“不以政府为对象”的组盟方式,改由各政党团体出面,幕后仍由各有关国家政府来支持。<sup>[42]</sup>

1964年8月2日,美国军舰“马多斯号”(USS Maddox)自台湾基隆港出发,在东京湾(Tonkin Gulf)一带进行侦查巡逻任务时,声称遭到3艘北越P-4鱼雷艇攻击,因而决定加以还击。此刻在该海域附近巡弋的美军航空母舰闻讯后,立即派遣战斗机增援,并击沉北越一艘鱼雷艇,重伤另一艘。8月4日,“马多斯号”与另一艘美国军舰再次前往北越沿海巡弋。当天晚上,这两艘舰艇上的美国军官根据雷达显示,向华盛顿报告称其再次受到北越军队攻击,因此进行另一波还击。尽管现今解密文件显示,这一系列事件实为美方夸大、虚构与误判,然而在当时真相未明朗的情况下,8月7日美国参、众两院全票通过《东京湾决议案》,授权约翰逊(Lyndon B. Johnson)总统对北越采取包括武力在内的一切必要举措,翌年(1965)2月起,美军开始对北越展开大规模战略轰炸,自此越战全面升级,进入一个新的阶段。<sup>①</sup>

“东京湾事件”发生后,台湾高层认识到越南战场上的情势已经发生重大变化,蒋介石因而于8月21日再度派遣王升访问西贡,讨论台、越双方进一步的军事合作。王升除了密集会晤南越军政高层之外,还特别向美国驻越军援司令威斯特摩兰将军(William Westmoreland)进行简报,介绍台湾的政治作战制度。在此次简报之后,美方正式认可政战制度确实有利于南越的反共作战,双方当即决定台湾从速派遣一军事顾问团,长期留驻西贡,协助南越建立政战制度。<sup>[43]</sup>经蒋介石核定,台湾驻越军事顾问团一行15人由邓定远担任团长,于10月8日抵达西贡,随即展开运作。1965年12月,阮庆核定成立一新的政战总局,该机构比照台湾的政战体系,全力推动南越部队的反共政治作战与心理战训练,同时建立起各级政战相应组织。美国驻越军援司令部为了配合南越军队政战工作的推行,特别将其心理战部门予以扩编,改名为政治作战处,并向南越政战总局与所属各单位派驻顾问,与台湾的军事顾问团合作推展南越军队的政战业务。<sup>[44]</sup>

随着越战局势日益升级,台湾驻越军事顾问团也逐步扩编。1966年3月,团员从最初的15人扩编至31人,除了向南越政战总局及所属各部门派驻顾问外,也开始在各战术区司令部与海、空军司令部门内派驻顾问。<sup>[45]</sup>在此之前,台北的国安单位早已强化与南越之间的情报合作。蒋介石曾提出台、越双方共同派遣情报人员,跨过北纬17度线向北越渗透,合作调查共党活动与阴谋。后因南越方面无法提出合适人选而作罢,然而台、越双方合作以海路渗透北越的计划,则于1963年夏天展开,但是这一渗透北越的行动,出师不利。该年7月,17位国民党特工人员在偷渡登上北越所辖广宁省(Quang Ninh)海岸时被逮捕,另一批人数不详的国民党与南越敌后人员,也在当年10月被捕,并于翌年夏天遭北越当局审判。<sup>[46]</sup>1967年2月,台北与西贡方面进一步达成协议,将驻越“顾问团”改名“军援团”,团长亦改称为司令,与美、韩、菲、澳、纽、泰等其他军援团地位平等。台湾此刻除了协助政战工作之外,还派遣两百余名各种技术与专业人员,协助推动南越的农业技术、公共工

① 有关东京湾事件的经过与争议,参见 Robert S. McNamara, *In Retrospect: The Tragedy and Lessons of Vietna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5, pp. 127-144; Aid, *The Secret Sentry*, pp. 80-104.

程、医疗服务、交通与电力建设。根据美国国务院资料,1964年至1967年春天,台湾以本身资源对西贡当局所提供的经济援助,已达近百万美元。<sup>[47]</sup>这还不包括台湾在本岛各军事基地向美军所提供的后勤协助、允许美方在台部署战略轰炸机、台湾空军自1962年起即执行的中南半岛空运和空投行动(即前述“南星计划”),以及其他尚未浮出台面的诸多秘密军事装备援助。例如,1965年9月,台湾向南越提供数艘非武装两栖登陆舰,作为南越政府近海运送物资所用,并且还秘密派遣国民党海军驾驶,以“私人身分”参与协助越方。<sup>[48]</sup>在越战情势达到最高峰的20世纪60年代,台湾对南越的实质援助极为可观。

#### 四、越战与蒋介石反攻中国大陆西南五省计划

面对亚洲冷战因越战局势逐步升温,蒋介石也尝试着结合越战与其念兹在兹的反攻大陆计划。20世纪60年代初期,台湾曾想利用中国大陆三年饥荒,发动一项代号为“国光计划”的反攻大陆军事行动,然而因为美国政府强烈反对,该计划最后无果而终。<sup>①</sup>台湾知悉美国不可能同意其发动正规军事行动,也理解到若无美方后勤支持,任何大规模反攻计划都将无法实现。如何让“光复大陆”这一凝聚军民士气与维系国民党政权正当性的目标,能够维持不坠,成了蒋介石所面临的一项严肃课题。而越战的升级与台湾在其中所可能扮演的角色,让台北找到了一个新的着力点。1964年初,阮庆上台执政后不久,台湾高层首次与美方讨论其在越南战场上扩大参与的问题。2月24日,蒋介石在与美国太平洋防卫司令部指挥官费特上将(Admiral Harry D. Felt)会晤时,美方首次探询台湾有无意愿派遣地面部队投入越战,蒋当下表示愿意认真考虑。<sup>[49]</sup>3月24日,蒋介石与美国中情局副局长克莱恩(Ray S. Cline)会面时,他进一步向美方表示,若美国同意台湾愿意以“非正规”军事手段,积极投入破坏北越与越共军事基地的武装行动,他并且向美方保证,一切后果由台湾来承担,决不会破坏美国的国际声誉,也不会引燃世界大战。<sup>[50]</sup>

然而,有鉴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台湾欲参与朝鲜战争却遭到美方拒绝的历史教训,此刻恐怕连蒋介石本人都不相信,台湾正规部队能够有机会真正参与越战。因此,当美国国务卿腊斯克(Dean Rusk)于两个月后访问台北时,蒋介石突然改变论调,称“越战应让越南人来打、国共内战让中国人自己打”,不再强力主张台湾部队前往中南半岛。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这时首度向美方高层推销他的一个新论点,即整个越南问题的核心不在河内,而是在北京;美国如不先设法解决中共问题,则终将无法有效解决越战问题。然而,腊斯克显然不被蒋的此番论调说服,他当场反驳称,至今没有明确证据足以显示胡志明的军事行动,是来自北京的指示,也没有情报指出中共在北越或者南越境内从事积极行动,蒋介石闻后颇感吃惊,但并未进一步反驳。<sup>[51]</sup>尽管如此,此后台湾还是不断利用各种场合向美方强调,中共对北越胡志明政府与南越境内越共分子的支持,是整个越战问题的核心。同年8月“东京湾事件”发生后,台湾进一步强化这一论述,宣称美国若要打赢越战,就必须先设法切断中共对北越的补给线。当时即有美国驻台外交官注意到,蒋介石似乎有意利用越战的升级,让国民党部队进入华南与西南各省份,与美国在中南半岛上的军事行动形成共振和联系。<sup>②</sup>

① 有关20世纪60年代“国光计划”始末,参见彭大年编《尘封的作战计划:国光计划-口述历史》,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室,2005年。

② 当时美方注意到台湾军方在东沙岛上扩建6千英尺跑道以及其他军事设施,这可拉近台湾空军在华南与东南亚地区至少250英里的空中距离,此亦显示国民党政府已把目标逐渐转移至东南亚地区,参见“Jerald Wright to Dean Rusk”, August 21, 1964, No. POLI CHINAT-US, in *China 1963-1966*, reel 38.



1965年2月,位于越南中部波来古(Pleiku)的美军基地遭到北越军事攻击,华盛顿随即下令向北越发动首次报复性的大规模轰炸。4月下旬,约翰逊总统的越南特使洛奇(Henry C. Lodge)前往台北,听取国民党高层对越战局势的看法。蒋介石除了重申越南问题的根源在北京,以及表明台湾愿意投入切断中国大陆对北越补给线的行动之外,时任“国防部长”的蒋经国甚至利用这个机会大胆探询美方对海南岛战略地位的看法。蒋经国特别想明确,美国是否认为海南岛将成为美军大举介入越战的一项重大威胁,以及国民党军设法反攻收复海南岛的可能性。<sup>[52]</sup> 该年7月24日,一架美军F-4C战机被北越击落,这让极端愤怒的约翰逊总统决定进一步增加越南战场上的美军人数至12万5千人。两天后,约翰逊致函蒋介石,除了告知美国政府准备增兵越南的决定之外,还提出希望台湾进一步扩大协助南越政府的请求。<sup>[53]</sup>

蒋介石接获此函后,认为时机已近成熟,决定派遣蒋经国前往美国,正式推销一套代号为“大火炬五号”(Great Torch Five)的空降收复中国大陆西南五省的计划。同年9月22日,蒋经国抵达华盛顿进行一连串拜会。在与约翰逊总统会谈时,蒋忠实地传达了他父亲的讯息,希望台、美双方努力寻求共同对抗中共的战略目标与谅解。约翰逊对此没有正面回答,只是重申美国的越南政策,同时感谢台湾对南越政府的经济与技术援助。<sup>[54]</sup> 蒋经国随后与美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进行近两小时的会谈,详细介绍了“大火炬五号”内容。他称华南与西南的粤、桂、滇、贵、川五省,是中国大陆与中南半岛之间的缓冲地带,若国民党能够拿下西南五省,整个中南半岛乃至全东南亚地区将可获得安全保障,而且美国在越战的困境也将可迎刃而解。蒋坚称美军不需直接介入,只需提供后勤与海、空运输支持,协助国军特种部队空降并占领各重要据点即可。为了取得美方的信任,蒋经国甚至动之以情,坦承不仅蒋介石也许连他本人在有生之年,都将无法实现光复大陆的最高目标。他父亲所希求的,是在美国协助下,把握住每一次能够打击中共的机会。麦克玛拉当场反问蒋经国,有何证据显示只要国民党军登陆中国西南各省,当地老百姓即会揭竿而起,支持国民党?对此,蒋经国仅笼统回答称,西南五省的反共力量最强,蒋介石所享有的声望最高,而且中共在当地的军事力量最为薄弱,麦克玛拉最后答允对该计划进行全面评估与研究,然后再答复台湾。<sup>[55]</sup>

在接下来数周里,美国军方高层着手对“大火炬五号”进行评估,此时美方对于越战所持的基本原则仍是避免与中共直接发生军事冲突。因此,对台湾希望美方支持空降占领西南五省的构想根本不可能接受。此外,美方也指出“大火炬五号”的两大严重缺陷:一是国民党出兵西南五省时,必定需要美军海、空掩护与地面部队保护,然而当时此举绝无实现之可能;二是目前仍缺乏明确证据显示国民党部队空降西南之后,会受到当地百姓的支持,这样即便美国愿意鼎力支持台湾,也终将无法在中国大陆上获得成功。<sup>[56]</sup> 1966年1月24日,美国驻台北“大使馆”代办恒安石(Arthur W. Hummel Jr.)奉命向蒋经国转答美方无法支持“大火炬五号”的讯息,蒋经国闻后愤怒异常,他称台北与美国坦率交心,提出有建设性的建议,以求根本解决越战核心问题,然而美方却不愿考虑、讨论改方案的可行性,这严重损害了台湾民心士气;恒安石回应强调华盛顿仍愿意与台北扩大协商与对话,讨论台湾所提出的任何战略构想,但此时蒋经国表示他看不出有这种必要性;当恒安石再次提出台、美双方进一步合作来搜集、交换并分析中国大陆情报,藉以确切掌握西南五省民心归向时,蒋经国一口回绝,称若无外力的煽动与施压,中国大陆内部是不可能出现大规模反共运动的,唯有大量军队空降并占领西南各省时,该地区才会出现反共运动热潮,双方会面最后不欢而散。<sup>[57]</sup>

“大火炬五号”成为国民党政府最后一次正式向美方提出的军事反攻大陆的计划,该案在遭到华盛顿反对后,台北政坛开始弥漫着一股悲观的气氛;蒋介石对无法把军事反攻大陆的最高政策与越战升级局面进行结合,让台北的军事、外交与国防安全,与美方参加越战、乃至美国在整个亚太地区重要战略利益紧密连结起来,备感挫折。<sup>[58]</sup> 尤有甚者,随着美国陷入越战深渊,不断投入庞大的

军事战力与资源,这对于当时美国对台的军事援助承诺,也出现了资源上的排挤效应,对台湾极为不利。该年5月,美方临时决定撤出驻防台中清泉岗基地的F-104战机中队,改挪用他处。但是因为越战因素,美国无法立即以其他战机补充以确保台海空防。当时蒋介石担忧两岸空军力量严重失衡,影响台海安全,要求美方迅速交拨台湾已向美方订购的F-5新战机,取代被抽调的F-104机群。美方则回应称因为所有新战机必须优先用于越南战场上,故无法满足这一要求。同时,当蒋介石进一步获悉原本美方已经批准运交台湾的47辆M-113型装甲运兵车,也因为越战急需而必须推迟18个月方能运来时,不禁大为震怒。台北政坛上下普遍夹杂着对于越战严重影响美国对台军事承诺的不满,以及美国可能改变对华政策的高度担忧。<sup>[59]</sup>

## 五、“越战越南化”之后的台、越关系

自1968年1月30日起,北越发动规模空前的“春节攻势”,总兵力达55万的北越部队与越共游击队,对南越境内几乎所有的大小城市,同时发动军事进攻。西贡的总统府、机场、电台、重要军政机构与美国大使馆等地,无一幸免。经过数周鏖战,虽然美军与南越部队最后瓦解了此次攻势,并且重创北越与越共武装力量,然而此役却彻底击垮了美国国内对于能否赢得越战的信心。广大美国人民不再相信美国能够赢得越战,全美各地的反战声浪风起云涌,抗议与示威声浪不断,整个社会因越战而严重撕裂,这迫使约翰逊总统于3月31日在电视上宣布将逐步终止对北越的空中轰炸行动,美军逐步撤出越南以及放弃竞选连任总统。<sup>[60]</sup>蒋介石对约翰逊的决定感到“震惊与疑虑”(shock and misgiving),他告诉美国人他实在想不出来,未来还有谁能够收拾越战残局,并应付一个愈加混乱的东亚局势。<sup>[61]</sup>该年11月初,美国正式宣布全面停止对北越的轰炸,然而因为南越总统阮文绍坚持拒绝与北越进行和谈,这遭到美方指控其有意破坏美政府所提议的停火协议,阻挠华盛顿与河内之间可能出现的和平契机。为此,阮文绍特地派员向台北解释其立场,并寻求台湾的坚定支持。<sup>[62]</sup>眼见南越政府民心士气恐因美国准备改变越南政策而受到不利影响,12月蒋介石再度派王升访问西贡,向阮文绍提出他对时局的观察。蒋提醒越方应注意新的局势变化,同时应把注意力集中在对付南越境内幸存的越共游击势力,越方则希望此时已垂垂老矣的蒋介石,能够继续出面积积极推动其数年来不断倡导的亚洲反共联盟。<sup>[63]</sup>

然而,阮文绍的想法终究抵不过国际现实的考验。1969年初,美国新总统尼克松上台后,全力推动“越战越南化”政策,以谈判代替对抗,让美国“体面地”退出越南战场,把越战问题留给越南人民自行解决。其具体作法包括:一方面开始打开与北越当局沟通的大门,双方在巴黎进行停战谈判;另一方面则开始秘密轰炸柬埔寨境内的北越军事基地,逼迫河内让步妥协。<sup>[64]</sup>为了缓和美苏之间关系并且对苏联施压,尼克松与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甚至逐步转变美国对华外交政策,决心打开与中共交往之门。1971年夏天,基辛格经巴基斯坦密访北京,与周恩来会晤。这一消息震惊全球,3个月后台湾在联合国的席位被中国大陆所取代。翌年(1972)2月,尼克松访华与毛泽东会晤。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已是既定的目标,再无回头路。随着美国对华政策出现战略性转变,以及国民党政府国际地位的一落千丈,未来台、美关系如何演变,东亚地区国际局势如何发展,都让蒋介石感到忧虑与不安。

尽管如此,面对尼克松上台后所推动的中南半岛新政策,台湾依然尽可能地加以配合。1969年3月,美国开始对柬埔寨境内的北越军事基地展开轰炸,欲切断北越对南越境内越共分子的补给与渗透。1970年3月,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Norodom Sihanouk)访问法国与苏联,总理朗诺、国会主席郑兴(Cheng Heng)、施里玛达亲王(Prince Sisowath Sirik Matak)趁机发动政变,推翻西哈努克政权,建立高棉共和国(Khmer Republic),外交上采取亲西方、反共政策,并宣布与中共、北越、

北韩等国断交。<sup>[65]</sup>朗诺右翼新政权的成立,因有助于美国强化其对北越的施压,很快就获得华盛顿的支持。对台北而言,此刻中南半岛上出现一个反共的新高棉政府自是极表欢迎,因此在朗诺发动政变之后不久,台湾即密派其驻泰国“大使馆”公使董宗山前往金边访问,讨论双方建立“外交”关系与双边合作等事宜。<sup>[66]</sup>

然而,美国对于台北与金边之间准备恢复“外交”关系一事,却持反对看法。国务院透过驻台北“大使馆”告诉台湾高层称,朗诺新政权才刚起步,根基尚未稳固,国际社会是否愿意对其地位加以接纳与承认,仍属未定,双方此时恢复邦交,美国担心国际间将视朗诺新政权为一个失去中立外交立场的西方阵营傀儡,甚至引发中共的军事干涉。因而,美国向台北施压,劝阻其对金边的外交努力。<sup>[67]</sup>台北高层无法接受美方这种说辞,坚信台湾对朗诺的外交承认将有助于稳固其新政权。尽管如此,台北最后依然决定向美国妥协,决定台北与金边双方仅互设代表团,加强经贸与技术方面的合作与交流,但不正式建立邦交。

在军事层面上,蒋介石坚信朗诺政权的长久稳固当有助于南越情势的稳定,因而决心走自己的路。1970年夏,金边向台湾要求提供制造军火弹药的技术,以利其自行生产,自给自足。为此,蒋介石批示派遣军方技术人员前往金边考察,并予以适当协助,同时下令驻高棉代表团与美国驻金边大使馆密切研究,如何在不违反与美方的协防条约前提下,由台湾军方提供高棉各项军火物资。<sup>[68]</sup>1971年春,台北方面以“惠远演习”为代号,向朗诺政府提供了50门81迫击炮,50挺机关枪,1万2千套的军服、军鞋、子弹袋等装备用品,以及两个营的通信装备,并允诺派员前往高棉协助修复其他相关军事通讯设备。为了保密起见,所有军备物资的“国军”字样都被涂掉,国民党军方还配合国安部门,于该年7月中旬用一架C-119运输机秘密将各项物资运送至金边。<sup>[69]</sup>同时,台湾也配合美方要求,另外调拨10门75山炮援助高棉部队。<sup>[70]</sup>1972年9月,国民党军方更依循南越模式,派遣一个军事顾问团进驻金边,协助高棉部队建立政治作战制度。<sup>[71]</sup>

然而台湾以意识形态与地缘战略为出发点,对中南半岛上两个反共政权所提供的援助,终究抵不过这些政权本身内部的权力倾轧与高度脆弱性,以及美国因推动“越战越南化”而逐步抽身所引发的信心危机。早在1970年秋,台北高层即从其驻金边代表团得知,朗诺与其他两位发动政变的主角郑兴、施里玛达亲王彼此猜疑,甚至牵连南越政局。盖当时阮文绍总统与副总统阮高祺(Nguyen Cao Ky)彼此亦不睦,与阮高祺关系密切的朗诺,怀疑施里玛达亲王准备串通美方中央情报局、阮文绍与南越当时在高棉的驻军,一同发动政变以推翻其领导。<sup>[72]</sup>当王升于1972年7月奉命访问高棉时,亲眼目睹了金边政坛的混乱;当时朗诺当选高棉共和国首任总统,且决心引进台湾的政战制度,因此邀请王升前往访问,然而王升在写给蒋经国的观察报告中却坦言,未来这套反共制度的成败,仍取决于高棉军队以及政府官员能否放下成见,同心协力努力推动实践,共同面对外来威胁。<sup>[73]</sup>

1973年1月23日,美国与北越在巴黎签订停火协议。依照该协议,所有美国与其他各国的军队与军事人员,必须于该年3月底以前全部撤出南越境内,国民党驻越军援团因此于该年3月12日结束了长达9年的援越工作,全体团员束装返回台北。南越政府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急切希望台北能够继续给予援助。4月12日,阮文绍访问台湾寻求支持,此时蒋介石的健康状况极差,已经无法接待外国元首。在与“行政院长”蒋经国会谈过程中,阮文绍对于亚太地区前景表示悲观,认为各国普遍误解“尼克松主义”的真实意涵,误认为美国已经彻底改变亚洲政策,导致各国根本上已丧失对抗共产主义的信心与决心。阮文绍请求台湾考虑协助南越重建国家,提供技术与人才援助,这一要求获得蒋经国的首肯。<sup>[74]</sup>值得一提的是,在阮文绍停留台北期间,他曾特别驱车前往位于阳明山上的“国家安全局”,听取台湾方面对于未来中共动态的情报分析。“国安局长”周中峰向南越通报称,苏联并非没有可能阻止中共对北越的援助,然而事实上却办不到,而且一旦苏联说服

北越和平解决越战,则中共极有可能对南越境内的越共分子提供直接的援助以助其叛乱,藉以平衡与抵制苏联在北越的影响力。当阮文绍质疑中共是否真有能力长期支持越共分子对抗南越政府时,周中峰答复是肯定的。<sup>[75]</sup>

阮文绍是否真正相信在各国军队陆续撤出、西贡当局陷入孤立无援的局面下,还能够继续抵挡北越与越共的威胁,不无疑问,而在南越沦亡前的最后两年里,台湾几成了全世界愿意继续协助南越的仅存政权。1973年5月初,台北以“驻越建设顾问团”名义,派遣35名军事顾问,由曾任吴庭艳心战顾问的刘戈仑率队前往,取代被解散的驻越军援团,继续协助南越部队加强政治作战、心理战、治安与社会福利等各项业务,顾问团还将各团员分别派驻在南越各战区里,与部队共同生活在战地里,协助推展政战业务。<sup>[76]</sup>然而,随着越南局势恶化,“驻越建设顾问团”的工作也日益困难。1975年元月,北越向北纬17度以南发动大规模攻击,占领南越数省。3月,占领中部高原重镇邦美蜀(Ban Me Thuot),派驻该地区的建设顾问团成员,被迫与当地越南百姓一同逃难,而派驻岘港(Da Nang)的国民党顾问,甚至几乎无法顺利脱逃,情况危险万分。眼见越共即将进逼首都西贡,“驻越建设顾问团”决定撤离,并于4月5日与18日分两批撤返台湾。此后不到两周时间,南越即宣告解放,而邻近的高棉朗诺反共政权,则先于4月17日落入红色高棉手中,驻金边的国民党代表团与军事顾问团,同样于仓皇之中撤离。<sup>[77]</sup>台湾对中南半岛战事的参与,至此也画下了一个休止符。

## 结语

1975年4月21日,阮文绍在内外交困下被迫交出总统职权,搭上一架美国军机,开始他流亡海外的余生。而他离开越南的第一个落脚处就是台湾。此段过程无异见证过去数十年间,双方在亚洲冷战场上唇齿相依的关系。<sup>[78]</sup>1949年于国共内战中失利,自四川转进来台的国民党政府,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曾思忖运用留越国民党部队,作为协助法、美等国参与对抗中南半岛上共产党势力的一支可用武力。同时,作为培植中国西南地区反共游击势力的力量之一,虽然此构想因法越殖民当局的反对而无果而终,但是台湾以“留越国军管训总处”为据点,在亚洲冷战初期将其发展成为台湾向中南半岛地区与中国大陆西南各省,派遣情报与特务人员,以及滇缅地区与西南各省反共游击队后撤、重新布置与中转的重要跳板与枢纽。1954年日内瓦会议后,南、北越各自成立政权,台北与西贡之间,也因为共同的反共意识形态与地缘战略利益,发展出紧密的盟邦关系。虽然,由于主、客观因素台湾的军事部队未曾直接参加越南作战,但在整个越战最高峰的20世纪60年代,台湾对南越所提供的政治、经济与技术援助,以及对南越军方包括建立政治作战体制与提供军事武器装备与人员等方面的援助,皆属可观。

1964年,当美国逐步升级越战时,蒋介石也试图将台湾的军事与战略价值,与美国的越战目标紧密地结合起来。在不同场合里,台北高层开始不断强化“越战问题的核心在于中共”这一论断,坚称解决越战问题必须先切断中共对北越的援助,而台湾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做出具体贡献。1965年秋天,蒋经国访问美国时,向美国大力推销“大火炬五号”反攻西南五省方案,即是“越战与国共内战结合”思路下的产物,只不过当时陷入越战泥沼的约翰逊总统,无法接受将越南战场延伸扩大至中国大陆的危险构想。该计划也是蒋介石生前最后一次向美方正式提出的军事反攻大陆构想,随着美方资源大量投入越战,美国对台湾的防卫承诺也捉襟见肘,遑论支持其反攻大陆。

1969年美国尼克松上台后,努力推动“越战越南化”政策,逐步自越南撤军,把战场留给西贡当局自己来善后。在越战的最后数年里,台北从反共的意识形态与亚太地区地缘与战略利益出发,成为国际上少数继续坚定支持南越的政权之一。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在台北过世。同月,国民党在中南半岛上的两个反共友邦高棉与南越也先后沦亡,这不但是一场旷日持久战争的终结,

也是一个时代的结束。1949年于国共内战后退守台湾一隅的蒋介石,虽然注定无法成为国际冷战大格局下的重要角色,然而如同本文所显示,蒋介石与他所领导的国民党政府,在区域性的亚洲冷战场上,扮演了一个无法被忽略与遗忘的角色。

注释:

- [1] 黄杰《留越国军日记》,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9年,第61-62、71-72、88-90页;黄翔瑜编《富国岛留越国军史料汇编(一)——入越交涉》,台北“国史馆”2006年,第XI页。
- [2] 《白崇禧呈蒋介石》(1950年2月7日),《白崇禧报告转战情况及入越编成志愿军构想》,《“国防部”史政档案》(以下简称《史政档案》),“国防部”史政局藏,档案号:0042828。
- [3] 《参谋总长顾祝同呈蒋介石》(1950年3月2日),《滇桂越缅边区国军战况及刘嘉树等部求援情形》,《史政档案》档案号:0042857/015;《蒋介石致顾祝同》(1950年3月9日),同前。
- [4] 《刘嘉树呈蒋介石》(1950年1月12日),《滇桂越缅边区国军战况及刘嘉树等部求援情形》,《史政档案》档案号:0042857/001。
- [5] 《王东原呈蒋介石》(1950年1月19日),《滇桂越缅边区国军战况及刘嘉树等部求援情形》,《史政档案》档案号:0042857/001;《蒋介石电刘嘉树》(1950年1月20日),同前。
- [6] 《王东原呈蒋介石》(1950年1月19日),《滇桂越缅边区国军战况及刘嘉树等部求援情形》,《史政档案》档案号:0042857/002;《白崇禧呈蒋介石》(1950年1月24日),同前,档案号:0042857/003。
- [7] 《顾祝同呈蒋介石》(1950年2月14日),《滇桂越缅边区国军战况及刘嘉树等部求援情形》,《史政档案》档案号:0042857/013;《顾祝同致联勤总司令部兵工署》(1950年2月18日),同前,档案号:0042857/018。
- [8] 黄杰《留越国军日记》,第100页;黄翔瑜编《富国岛留越国军史料汇编(一)——入越交涉》,第387-388页。
- [9] [25][66] 陈鸿瑜《“中华民国”与东南亚各国外交关系史(1912-2000)》,台北:鼎文书局,2004年,第249-250页,第282-288页,第514页。
- [10] [13][17][18][19][20][21] 黄杰《留越国军日记》,第157页,第188页,第216-217、476页,第218页,第391页,第533页,第218、225、232页。
- [11] 黄杰《留越国军日记》,第166页;“U.S. Embassy Taipei to State Department, February 16, 1951”, No. 794A.00(W)/1-2751, in Michael Davis (ed.), *Confidential U.S. State Department Central Files: Formosa, Republic of China 1950-1954* (以下简称 *Formosa 1950-1954*), Frederick, MD: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 1986, micro-film, reel 3.
- [12] 黄杰《留越国军日记》,第154页;黄翔瑜编《富国岛留越国军史料汇编(一)——入越交涉》,第389-390页。
- [14] “Rankin to State Department”, July 2, 1951, No. 794A.5-MAP/7-251, in *Formosa 1950-1954*, reel 5; “US Embassy Paris to State Department”, July 5, 1951, No. 794A.5-MAP/7-551, *ibid*; “US Consulate-General in Saigon to State Department”, July 13, 1951, No. 794A.5-MAP/7-1351, *ibid*.
- [15] “Dean Acheson to U.S. Legation in Saigon”, September 26, 1951, *FRUS 1951*, 6: 1, pp. 524-525; 黄杰《留越国军日记》,第209-210、235、272页。
- [16] 黄翔瑜编《富国岛留越国军史料汇编(一)——入越交涉》,第415-418页; “Rankin to State Department”, May 1, 1953, No. 794A.00(W)/5-153, in *Formosa 1950-1954*, reel 3; “US Embassy Taipei to State Department”, May 8, 1953, No. 794A.00(W)/5-853, *ibid*.
- [22] Robert J. McMahon, *The Limits of Empire: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utheast Asia Since World War II*,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63-68.
- [23] “Rankin to State Department”, October 2, 1954, No. 794A.00(W)/10-254, in *Formosa 1950-1954*, reel 4.
- [24] Seth Jacobs, *Cold War Mandarin: Ngo Dinh Diem and the Origins of America's War in Vietnam, 1950-1963*,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6, pp. 93-96.
- [26] [36][45] 陈祖耀《西贡往事知多少——揭橥“中华民国驻越军事顾问团”的秘辛》,台北:黎明文化,2000年,

第 32-33 页,第 127-130 页,第 230 页。

- [27] 陈祖耀《西贡往事知多少——揭橥“中华民国驻越军事顾问团”的秘辛》,第 68-70 页;《越南吴总统与蒋经国副秘书长谈话记录》(1960 年 12 月 14 日),《忠勤档案/中越关系(一)》,《蒋经国“总统”文物》,国史馆藏,典藏号:00501010000083001。
- [28] 《驻越南“大使馆”武官李筱尧呈参谋总长彭孟緝》(1961 年 11 月 13 日),《协助越南制造械弹案》,《史政档案》,档案号:0045977。
- [29] 《李筱尧呈国防部》(1962 年 5 月 16 日),《越南函件》,《王升档案》,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藏,Box 13;《国防部总政治作战部签呈》(1962 年 7 月 24 日)同前。
- [30] 《王升呈蒋经国》(1962 年 11 月 24 日),《越南函件》,《王升档案》,Box 13;《王升呈蒋经国》(1963 年 2 月),同前。
- [31] Matthew M. Aid, *The Secret Sentry: The Untold History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Agency*, New York: Bloomsbury Press, 2009, pp. 58-59.
- [32] 衣复恩:《我的回忆》,台北:立青文教基金会,2011 年,第 337-338 页;翁台生:《CIA 在台活动秘辛》,台北:联经出版社,1994 年,第 251-266 页。
- [33] “Everett F. Drumright State Department”, November 24, 1961, No. 793.00(W)/11-2461, in U.S. Department of State, *Confidential U.S. State Department Central Files China: 1960-January 1963: Internal Affairs* (以下简称 China 1960-1963), Bethesda, MD: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 1998, microfilm, reel 9; “Drumright to State Department”, December 30, 1961, No. 793.00(W)/12-3061, *ibid.*
- [34] “Drumright to State Department”, December 15, 1961, No. 793.00(W)/12-1561, in *China 1960-1963*, reel 9; “Drumright to State Department”, February 23, 1962, No. 793.00(W)/2-2362, *ibid.*
- [35] [78] Stanley Karnow, *Vietnam: A History*,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84, pp. 277-281, pp. 196-197.
- [37] [38] 《蒋介石日记》,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藏,1963 年 11 月 2 日,1963 年 11 月 3 日。
- [39] Robert Shaplen, *The Lost Revolution: Vietnam 1945-1965*, London: André Deutsch, 1966, pp. 332-333; A. J. Langguth, *Our Vietnam: The War, 1954-1975*,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2002, pp. 276-280.
- [40] 《王升呈蒋经国》(1964 年 2 月 1 日),《越南函件》,《王升档案》,Box 13;《王升致阮庆庆主席函》(1964 年 2 月 2 日)同前。
- [41] “Jerald Wright to State Department”, August 21, 1961, No. POL 1 CHINAT-US, in U.S. Department of State, *Confidential U.S. State Department Central Files China: February 1963-January 1966: Part I: Political, Governmental, and National Defense Affairs* (以下简称 China 1963-1966), Bethesda, MD: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 2001, microfilm, reel 38.
- [42] 《驻越高浩检呈关于陈善谦将军访华返越后反应情形及副总理杜茂建议事项之报告》(1964 年 4 月 15 日),《忠勤档案/中越关系(一)》,《蒋经国“总统”文物》,典藏号:00501010000084011。
- [43] 《驻越军援团越南政治作战简报》(1967 年 12 月),《忠勤档案/中越关系(二)》,《蒋经国“总统”文物》,典藏号:00501010000023002; “Jerald Wright to State Department”, August 21, 1961, No. POL 1 CHINAT-US, in *China 1963-1966*, reel 38.
- [44] “Memorandum from William P. Bundy to Dean Rusk, Subject: Interest at Highest Levels in Expanding GRC Assistance to Vietnam”, May, 6 1967, in Robert E. Lester (ed.), *The Lyndon B. Johnson National Security Files, Asia and the Pacific: National Security Files, 1963-1969* (以下简称 LBJ 1963-1969), Frederick, MD: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 1987, microfilm, reel 4; “State Department Memorandum, Subject: Military Assistance Program”, May 5, 1967, *ibid.*, reel 6.
- [46] “Thomas Hughes to Dean Rusk, June 4, 1964”,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s,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Washington D.C., *U.S. Intelligence and China: Collection, Analysis, and Covert Action*, No. CI01616; 杨瑞春:《国特风云——中国国民党大陆工作秘档(1950-1990)》,台北:稻田出版社,2010 年,第 470 页。
- [47] “State Department Memorandum, Subject: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Vietnam”, May 4, 1967, in *LBJ 1963-1969*, reel 6.

- [48] “Ralph N. Clough to State Department”, August 12, 1965, in *LBJ 1963–1969*, reel 3; “Arthur W. Hummel Jr. to State Department”, September 14, 1965, *ibid.*
- [49] “Jerald Wright to Dean Rusk”, February 24, 1964, No. POL1 CHINAT–US, in *China 1963–1966*, reel 38; “CINCPAC to US Joint Chiefs of Staff, top secret”, February 25, 1964, in Robert E. Lester (ed.), *The Lyndon B. Johnson National Security Files, 1963–1969. Asia and the Pacific: First Supplement* (以下简称 *LBJ 1963–1969 Supplement*), Bethesda, MD: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 1996, microfilm, reel 1.
- [50] “Wright to Dean Rusk”, March 27, 1964, in *LBJ 1963–1969 Supplement*, reel 1.
- [51] “Dean Rusk to George Ball”, April 17, 1964, in *LBJ 1963–1969*, reel 2.
- [52] “US Embassy Taipei to State Department”, April 23, 1965, No. POL 2–1 CHINAT, in *China 1963–1966*, reel 33;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Subject: U.S. Policy toward Vietnam”, April 23, in *LBJ 1963–1969 Supplement*, reel 1.
- [53] “President Lyndon Johnson to President Chiang Kai-shek”, July 26, 1965, in *LBJ 1963–1969*, reel 6.
- [54] “Dean Rusk to US Embassy Taipei”, September 25, 1965, No. POL 7 CHINAT, in *China 1963–1966*, reel 33.
- [55] “CIA Intelligence Information Cable, Subject: Chiang Ching-kuo’s Desire to Discuss GRC/U.S. Strategy against Communist China”, September 22, 1965, in *LBJ 1963–1969 Supplement*, reel 1.
- [56] “George Ball to US Embassy Taipei”, January 10, 1966, No. POL CHINAT–US, in *China 1963–1966*, reel 38.
- [57] “Dean Rusk to US Embassy Taipei”, January 23, 1966, No. POL CHINAT–US, in *China 1963–1966*, reel 38; “Hummel Jr. to Dean Rusk”, January 25, 1966, No. POL27 CHINAT–US, *ibid.*
- [58] CIA Intelligence Memorandum, “Growing Pessimism among Nationalist Chinese Leaders,” OVI No. 0820/66, May 17, 1966, in *LBJ 1963–1966*, reel 4.
- [59] “Jerald Wright to Dean Rusk”, April 14, 1966, No. DEF19–3 US–CHINAT, in *China 1963–1966*, reel 10; “Dean Rusk to Hummel Jr.”, June 14, 1966, No. DEF19–8 US–CHINAT, *ibid.*; “Hummel Jr. to Dean Rusk”, June 15, 1966, No. DEF–19–8 US–CHINAT, *ibid.*
- [60] H. W. Brands, *The Wages of Globalism: Lyndon Johnson and the Limits of American Pow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249–252; Mark K. Updegrave, *Indomitable Will: LBJ in the Presidency*, New York: Crown, 2012, pp. 253–272.
- [61] “Walter McConaughy to Dean Rusk”, April 4, 1968, in *LBJ 1963–1969 Supplement*, reel 2.
- [62] 《为越南大使馆来略陈述越南最近发展情况请查照转陈由》(1968年11月26日),《忠勤档案/中越关系(三)》,《蒋经国“总统”文物》,典藏号:00501010000085006。
- [63] 《阮文绍总统与王升将军会谈笔录》(1968年12月5日),《忠勤档案/中越关系(三)》,《蒋经国“总统”文物》,典藏号:00501010000084024;《王升访越报告》(1968年12月8日),同前,典藏号:00501010000084025。
- [64] Henry Kissinger, *Diplomacy*,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4, pp. 674–683.
- [65] Ben Kiernan, *How Pol Pot Came to Power: Colonialism,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m in Cambodia, 1930–1975*,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298–310.
- [67] “McConaughy to State Department”, May 28, 1970, Reproduced in *Declassified Documents Reference System*, Farmington Hills, MI: Gale, 2013, No. CK 3100698563; “State Department to U.S. Embassy Taipei”, May 29, 1970, *ibid.*, No. CK 3100691793.
- [68] “U.S. Embassy Taipei to State Department”, July 23, 1970, in *Declassified Documents Reference System*, No. CK 3100688936; 《参谋本部签呈》(1970年7月30日),《军援高棉共和国案(惠远演习)》,《史政档案》,档案号:00034437;《高棉代表团致台北》(1970年7月30日),同前;《赖名汤呈蒋经国》(1970年8月3日),同前。
- [69] 《周中峯致赖名汤》(1971年2月5日),《军援高棉共和国案(惠远演习)》,《史政档案》,档案号:00034437;《参谋本部签呈》(1971年2月9日),同前;《参谋本部签呈》(1971年8月7日),同前;《赖名汤呈蒋介石》(1971年7月16日),《我国军援高棉案》,《史政档案》,档案号:00046060。
- [70] 《赖名汤呈蒋介石》(1971年7月21日),《我国军援高棉案》,《史政档案》,档案号:00046060;《蒋介石致赖名汤》(1971年7月30日),同前。

- [71] 《赖名汤呈蒋介石》(1972年8月8日),《派遣军事顾问团协助高棉建立政战制度》,《史政档案》,档案号:00049640;《张立夫致总政战部》(1972年8月10日),同前。
- [72] 《驻高棉代表团呈外交部》(1970年11月28日),《军援高棉共和国案(惠远演习)》,《史政档案》,档案号:00034437。
- [73] 《军事访问团访问高棉共和国报告书》(1972年7月12日),《访问高棉数据》,《王升档案》,Box 14;陈祖耀:《西贡往事知多少》,第255-262页。
- [74] 《蒋院长拜会阮文绍总统会谈记录》(1973年4月13日),《忠勤档案/中越关系(三)》,《蒋经国“总统”文物》,典藏号:00501010000085005。
- [75] 《周中峰呈蒋经国总统在本局简报后所提问题》(1973年5月31日),《忠勤档案/中越关系(三)》,《蒋经国“总统”文物》,典藏号:00501010000085004。
- [76] 陈祖耀《西贡往事知多少》,第308-311页;曾琼叶编《越战忆往口述历史》,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室,2008年,第118-120页。
- [77] 陈祖耀《西贡往事知多少》,第311-313页;陈鸿瑜:《“中华民国”与东南亚各国外交关系史(1912-2000)》,第516页。

[责任编辑:冯立军]

## Taiwan-South Vietnamese Relations during the Cold War

Hsiao-ting Lin

(Hoover Institu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USA)

**Abstract:** This article trac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aiwan and South Vietnam during the Cold War. Based on multiple archival materials and secondary source materials, this research addresses the following issues: the KMT's utilization of its exiled forces in Indochina to advance its infiltration into China's southwest; how the escalation of war in Indochina served as a crucial factor in the US-Taiwan relationship; the role Taiwan played in consolidating the Saigon regime; and Chiang Kai-shek's endeavors to connect the Vietnam War with his ultimate goal of mainland recovery. This article also illustrates how Taiwan continued to assist its falling allies in Indochina after Richard Nixon's "Vietnamization" of the Vietnam War in the early 1970s.

**Key words:** Chiang Kai-shek, Vietnam War, Ngo Dinh Diem